

红军长征之路,也是“辟谣之路”

长征时期,国民党广泛散播关于红军的种种恐怖而荒唐的谣言,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,污蔑诋毁党的光辉形象,给长征中的红军造成不良影响。面对恶劣的社会舆论环境,红军将士用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捍卫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,粉碎了敌人的阴谋。

国民党对红军实施舆论“围剿”

在长征途中,国民党一直搞所谓的“三分军事,七分政治”,企图在用武力“围剿”红军的同时,用谣言来孤立、打垮红军。国民党的谣言宣传,一般由特务、随军政治训练班、各地党部党务宣传员、各地方政府组织的宣传队以及地方聘请的地主、士绅等,经过“施以军事政治之严格训练”后再行分派各地工作。他们常用的手段是涂抹红军标语后粘帖自己的反动标语,在乡间聚会演讲,散发传单,甚至还多次用飞机空投撒传单。

1935年1月,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建立“云南省宣传总队”,从昆明派往昭通镇雄县开展反动宣传。据队员崔龙光回忆:“总队为国民党歌功颂德,涂脂抹粉,借机攻击、污蔑、谩骂共产党,开展反共谣言宣传。”与此同时,云南镇雄县国民党政府还开始组建“县宣传大队”“区宣传中队”“乡宣传小队”,到处张贴反动标语,召集政府职员和学校学生召开大会,高呼反动口号招摇过市。一时间,从街道到学校,从《云南民国日报》到偏远乡村的围墙,到处是红军“红眉毛,绿眼睛”“见人就杀,见房子就烧”等种种荒谬、耸人听闻的谣言,使得群众人心惶惶。

国民党这种有组织的造谣宣传不仅仅在云南开展,在贵州、四川等地也随处可见,比比皆是。1936年1月,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来到贵州石阡附近,国民党地方政府就大肆散播谣言:“前年共产党在这里吃过亏,这回来了就一定要报仇,非杀个鸡犬不留不可。”谣言引得石阡附近群众纷纷四处躲避,红军途经地方很多村庄封门闭户,不见人烟。当红军到达时,村里四处无人,买不到粮食,伤员也没地方救治,十分困难。种种可耻的谣言,给红军带来极大困难。

“玩火者必自灼”

国民党散布谣言的伎俩一旦被群众识破,往往会催生出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群众只会对国民党的色厉内荏、卑鄙无耻更为鄙视和厌恶。

1936年4月,为围堵红军,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镇雄县参加围堵,当地政府一再宣传“国民党军纪律严明”,要求群众“一致欢迎,毋庸惊恐”。然而当地百姓根本不信,因为1935年5月初川军参与围堵红军到镇雄一带时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,人们都说“宁肯红军过,不愿川军来”。

果不其然,中央军到当地后,拉夫抢粮、抢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,穷苦人民惨遭蹂躏,其惨状罄竹难书,就连当时国民党地方官员都气愤不已,镇雄县县长和麒麟乡、常德乡乡长纷纷向云南省政府报告,有的控诉“中央军九十九师不守军纪,民间受其痛苦者,实难堪悉述也”,有的报告“中央军四十七师,挨户驻扎,无论男女老幼一概

逐出,任意搜索,上至屋梁下至柱足,莫不挖掘殆尽……”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将污蔑红军“奸淫烧杀”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。

长征中,群众由最初受到国民党污蔑宣传所蒙蔽,四处逃散,到主动接触了解红军,再到为红军带路,提供情报,收治伤员,积极拥护红军,原因就是红军上门板、捆卧草、讲话和气、买卖公平等这些小事的纪律表现,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,国民党军队则因为肆意妄为、无恶不作而四处受困,这是谣言所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红军运用多种形式辟谣

1935年,中革军委发电至各军团要求:“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,进行破坏白军宣传。”由此,一个以宣传工作为核心的、多种多样的革命文化活动高潮便在长征中发展起来。

为打破敌人舆论“围剿”,辟除种种谣言,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,红军首先是就地印刷、张贴宣传材料,如在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《保护茅台酒通令》,就是红军针对当时谣言“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澡、洗脚”而作出的回应。

除印刷文告外,红军常见的宣传方式还有刷标语、画漫画,现今在广西龙胜县江底乡矮岭村巨石上刻着的标语“红军绝对保护瑶民”,就是针对国民党特务散布的“红军见人就杀,见屋就烧”谣言而写的。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休息时、宿营时、警戒时及短期驻留时,在桥上、墙上、井边甚至国民党县政府,宣传员的标语几乎无处不在。

1935年《红星》报第12期报道:“‘山西’(红军代号)在两天之内共写一万四千八百多条标语,其中干部写一万条……”还有更生动的漫画,较著名的有黄镇在长征途中作的《川滇边干人之家》《红军彝族游击队》等,现今川滇黔三省有记录的红军漫画作品大致有20余幅。

此外,红军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,如歌谣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等宣传方式。比如歌曲《红军纪律歌》、戏剧《蒋介石骂部下》、舞蹈《工农携手舞》等,在长征沿途曾广泛上演,受到群众热烈欢迎,极大地促进了军民联系和感情。特别是戏剧《我当

红军去》,“在长征中可算得‘保留节目’,每到一地,都少不了它”,这些丰富多彩的革命宣传,既鼓舞了红军士气,也教育了人民,打击了敌人的反动宣传。

敌人被自己的谣言反噬

谣言传久了,有时候散布谣言的敌人反而自己也相信了。以《云南民国日报》为例,1935年4月至6月,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报纸上反复宣称,“红军不过两三千人,皆已老而瘦,意志不坚”,“他们饥瘦已极,子弹缺乏,我联军四面包围,不难一鼓荡也”。这些明显编造的消息经地方报纸反复报道后,很多人真的相信了。在国民党地方守军中,他们的上司也多次讲:“红军衣冠不整,手持土枪、梭镖,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,武器精良。”

红军巧妙地利用敌人的这个错误认识,大摇大摆地“接收”了好几座县城,这就是杨成武将军在《忆长征》一书中记录的“智取三县”的故事。

敌人被自己的谣言所迷惑,不是偶然事件,而是国民党大肆散布谣言的必然反噬。陈云在《英勇的西征》一文中也记载了一件和“智取三县”如出一辙的事情,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一个县城时,敌人都传言红军是“土匪”,当他们见到一队整整齐齐、装备精良的红军时,误认为是“中央军”而热情款待,连忙给红军办好粮食等物资筹备工作,还吩咐10个本地人当向导,县城各机关负责人想方设法通报姓名来“拜访”,弄得红军将士哭笑不得。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昆明附近后,进嵩明城和过官渡时,红军是由当地县长及军警负责人“迎入”的,陈云还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一书中解释:不是滇军“通共”,而是当时云南“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匪,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衣衫褴褛,困苦不堪,并无新武器”“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,既未沿途抢劫,而且纪律好,公平买卖……因纪律、军容远优滇军,此非南京军而谁?因此排队欢迎”。国民党在愚弄和蒙蔽群众的迷梦中自我陶醉,谣言最后沦为笑柄,成为预示他们无能和失败的典型征兆。

据《党史文汇》陈金星 宋静/文

辛弃疾写词骂儿

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,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然而,鲜为人知的是,他还写过一首骂儿词。

那是庆元元年(1195年),辛弃疾56岁,他在福州担任知州兼福建安抚使。任期未满,他因身体不佳,决定回乡养老。这时,他的一个儿子劝他不要提前走,趁着还在位,抓紧置办一些上好田产,将来才能颐养天年。辛弃疾闻言大怒,写了一首《最高楼》:“吾衰矣,须富贵何时?富贵是危机。暂忘设醴抽身去,未曾得米弃官归。千年田换八百主,一人口插几张匙?便休休,更说甚,是和非。”在该词序言里,辛弃疾记下了来龙去脉:“吾拟乞归,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,赋此骂之。”

其实,辛弃疾是爱孩子的,比如那首《清平乐·村居》: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

笼。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写活了晚年他在乡间携妻带子、耕读传家的天伦之乐。

他和天下父母一样,也希望孩子聪明健康成才,比如《清平乐·为儿铁柱作》,“从今日日聪明,更宜潭妹嵩兄。看取辛家铁柱,无灾无难公卿”。他专门给年幼的儿子铁柱写了一首词,祝愿他像妹妹潭妹、哥哥嵩兄一样聪明,还希望自己的“辛家铁柱”平安吉祥,将来可以成为朝廷栋梁。这些质朴的话语,是人之常情,也是辛弃疾最真实的一面。孩子们要考试了,他又写诗说“秋举无多日,天书已十行。绝编能自苦,下笔定成章”。

然而,正因为他对孩子爱之深,所以责之切。当听到孩子劝他置办田产、不要辞官的时候,他出离愤怒,告诫他们再也不要有这样的念头。

据《科教新报》徐佳/文